

动员与参与

——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THE THIRD SECTOR

孙立平 晋 军 著
何江穗 毕向阳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THE THIRD SECTOR

动员与参与

——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

孙立平 晋 军 著
何江穗 毕向阳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 孙立平等
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0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徐永光主编)
ISBN 7-213-01946-5

I. 动… II. 孙… III. 社会救济-福利制度-研究
- 中国 IV. D66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707 号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动员与参与

——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

孙立平 晋军 何江穗 毕向阳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蔡玲平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张振华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 万 插 页 5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946-5/D · 281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徐永光

—

邓小平发动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清晰,剩下的主要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还相当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运行。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科学把社会组织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学术界把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称为“第三部门”。因此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非

2 动员与参与

营利组织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成为今日中国学术界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二

经过 10 年发展,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青基会不应该居功自傲,更不应该止步不前,我们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向着更崇高的目标义无反顾地挺进。10 年来,我们得到了社会的特殊关爱,因此也就要以十分出色的业绩回报社会,这是中国青基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非营利组织,中国青基会有责任通过自觉的、超前性的研究、探索、试验、示范,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增进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福祉。为此,中国青基会第三届理事会于 1998 年初成立了以康晓光为主任的“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希望通过该委员会组织和实施学术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活动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实现理事会确定的组织目标,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聘请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公益机构领导人担任委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青基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的组成既体现了价值观的多元性,又体现了学科的代表性。

1. 14/2

三

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以及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进入 90 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更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同样,“第三部门研究”也成为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我们设立“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的初衷,是考察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道路,研究相关的重大政策和法律建设问题,并借此推动第三部门乃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健康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第三部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发展经验,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发展经验。我们坚信,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分享人类的科学成果,进而有效地促进世界各国第三部门的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委员会把“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作为 1998—1999 年度工作的重点。经过反复论证、筛选,最终确定了 10 个研究课题。它覆盖了与第三部门有关的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募捐、资助、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律环境、文化功能、效益评估、转型期发展模式、发展历史、国际比较等方面。委员会邀请了国内外第一流的学者担任课题主持人,对各个课题主持人提交的研究方案进行了严格论证,并与各个课题主持人签订了课题委托合同。经过委员会与各位课题主持人近两年的通力合作,研究计划得以如期完成。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 10 部专著就是这项研究活动的成果。这些专著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切入,对中国第三部门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

4 动员与参与

上,都通过田野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都综合运用了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最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且进行了必要的国际比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专著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我相信,这10部专著的出版将把中国第三部门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必将对第三部门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尽管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集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为开展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一个第三部门的发展实践远远超前于理论研究的国度里,第三部门理论研究更具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有志于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我们将广泛吸收各个学科、各个流派的高水平的学者参与研究活动,并对课题实行高效率的管理,以确保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们将继续奉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原则,摒弃门户之见,吸收各派学者,形成海纳百川之势。

五

和中国青基会以往的一切工作一样,本项研究的成功也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青年基金会向一切关心和支持本项研究的人士和机构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精心组织了这项研究活动。感谢各位课题主持人及作者积极合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按时提交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对丛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在杨仁山社长、楼贤俊总编辑的亲自领导下,第二编辑室的全体同仁及各相关科室的同志们尽心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这套精美的丛书,为本项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还有许多人士和机构为本项研究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我却没能在此一一向你们表达谢意。但是我相信,只要这套丛书能够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有所贡献,你们就会原谅我的失礼,因为对于你们来说,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富裕的伟大事业相比,我的一句感谢是微不足道的!

1999年8月20日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徐永光

执行主编 康晓光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宁宁	王力雄	王绍光	孙立平
汪丁丁	汪 晖	李书磊	李 宁
李 强	杨 团	沈 原	陆人道
周志忍	胡鞍钢	秦 晖	袁 方
顾晓今	徐永光	郭于华	涂 猛
崔之元	康晓光		



课题负责人简介

孙立平，1955年出生，辽宁朝阳人。1978年2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业班学习。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主要研究成果有：《社会现代化》、《社会学教程》(合著)、《发展的反省与探索》、《走向现代之路》(合著)、《传统与变革》、《国外发展理论研究》(合著)、《当代社会学理论》(译著)、《社会冲突的功能》(合译)。

目 录

第一章 动员与参与的背景：“后总体性社会”	(1)
一、“总体性社会”与国家对资源的垄断	(2)
二、“后总体性社会”的出现	(8)
三、资源配置与民间公益事业的生存空间	(18)
第二章 希望工程合法性的获得	(25)
一、希望工程的发端	(26)
二、事业合法性：正视贫困与开放教育	(33)
三、组织合法性的建立	(45)
四、获得合法性的策略	(52)
第三章 准组织化动员	(61)
一、“总体性社会”与组织化动员方式	(62)
二、希望工程社会动员的初步尝试	(70)
三、希望工程准组织化动员方式的形成	(87)
第四章 以社会化方式链接体制资源	(103)
一、青基会系统的组织化	(104)
二、地方的体制运作	(113)
三、体制资源与社会化链接	(129)

2 动员与参与

第五章 希望工程与符号资源	(140)
一、希望工程的符号资源	(141)
二、希望工程符号资源的社会化运作	(153)
三、希望工程资本	(161)
第六章 大众的选择:现实与传统的结合	(171)
一、大众意识的唤起	(174)
二、社会规范与行为决策	(186)
第七章 一体化社会参与	(197)
一、从结对救助到'98 志愿者	(198)
二、组织依托与工作手臂	(211)
三、社会化监督	(230)
第八章 参与者行动分析	(237)
一、参与者的社会学特征	(238)
二、泛道德化参与	(246)
三、市场化参与	(265)
四、行政化参与	(272)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	(280)
一、希望工程的背景:“后总体性社会”	(282)
二、希望工程的资源动员	(284)
三、希望工程的社会参与	(289)
四、讨论与展望:从希望工程看“后总体性社会”中 民间社团的成长途径	(292)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01)

第一章 动员与参与的背景： “后总体性社会”

“希望工程”诞生于1989年，至今已整整10个春秋。在这10年中，“希望工程”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社会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对“希望工程”这10年的历程，无论是它的成就，它所遇到的问题，还是它所牵涉的社会背景，都是非常值得人们去深入思考的。

“希望工程”走过的这不平凡的10年，恰好正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非常关键的10年。在这10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说，这10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从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上说，在这10年之中，中国社会逐步由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走向一种“后总体性社会”。正是这种“后总体性社会”，构成了“希望工程”资源动员与参与的宏观社会背景。“后总体性社会”的种种结构性特征，对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这一阶段的一个产物，受到众人瞩目的“希望工程”也不例外，在它的发展历程上，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追溯并深入研究“希望工程”在这10年中的发

2 动员与参与

展轨迹,不仅对于人们认识“第三部门”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预期其前景,而且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总体性社会”与国家对资源的垄断

1. “总体性社会”中的资源垄断和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 20 个年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历时 20 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性过程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正是这种变化,为希望工程以及类似的民间公益事业、民间社会团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使用“总体性社会”^①与“后总体性社会”这两个概念来描述这种变迁的过程,从而为对希望工程中动员与参与的研究设定一个理论框架。

“总体性社会”的确立,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一系列历史过程的产物。在清代末期,中国社会开始遭遇现代化的挑战,同时,由于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衰败,在政治解体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解组。这样,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着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叠加在一起的总体性危机。因

^① “总体性社会”这个概念译成英文是 totalism,而美国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在分析中国当代政治的时候,则使用了全能主义的概念,英文单词也是 totalism。应当说明的是,“总体性社会”的概念直接受到“全能主义”这个概念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的使用方法以及强调的重点与之有些不同。

此,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从晚清开始形成、最后以军阀混战(政治整合危机)集中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第二,是如何在基础较差、资源条件并不很有利的情况下实现迅速工业化的民族主义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框架,除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背景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满足这两个最基本的需求有直接关系的。

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控制权和配置体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以没收官僚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控制资源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到1949年底,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达2858个,拥有工人129万多人。而当时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66%。据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当时没收的官僚资本约为人民币150亿元。到1956年底,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工业共有11.2万户(职工120万人)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私营商业有40万户实行了公私合营,另有144万户个体商户组成合作小组,还有48000多户个体手工业并入公私合营企业。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造步骤,国家实现了对土地以及其他农业要素的控制。1953年,国家对粮食和食用油实行统购统销,对一些二类农副产品(如生猪、鲜蛋等)实行派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安排、统一分配的城市就业制度,以及以城乡分割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国家统一录取并统一分配的高等教育制度。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一个社会成员要想取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必须从国家的再分配体制中获得相应的资源。否则,在这个社会中就失去了立身之本,或处于一种没有确定身份的境地。

2. “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结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构成几种不同的模式。

一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这种国家又可以称之为科层式的权威主义国家。在这种模式之中,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的胜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说适合这种模式,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在获得独立之初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在这样的国家中,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来说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能力,但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来源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比如,东亚国家和地区,国家自主性的形成至少与如下的几个因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首先是历史上的国家统治的传统,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在国家的层面上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大地产的不发达,特别是在外国统治时期,外国的殖民主义力量有效地削弱了大地产的力量,有的国家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也对于削弱大地产的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外国的援助的因素,因为外国的经济援助一般都是给政府的,这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力量。巴基和巴里克则将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的形成看作是对不断积累的危机的反应,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组建的,并一直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外部威胁。拉美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拉丁美洲,国家自主性的最初来源是前政权统治时期的阶级冲突和经济发展的失败。通过使民众中的各个阶级失去政治热情和非政治化,科层式的权威主义国家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从而能够实施较为长远的经济与政治变迁。巴基和巴里克实际上是在用“相对自主性的理论模式”来解释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的形成。在他看来,自主性的最初的来源是与一个社会中“如果没

有另外的因素介入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结构性阶级冲突”有关，换句话说，国家是在解决阶级冲突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超越的地位和自主性。

二是“弱国家一强社会”的模式。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国家很弱，但却面对着与国家同样强度或比国家更强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往往不是在对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时形成的，而是在革命、独立运动或权力的非正常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有相当一批国家是作为高度分化的实体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在这些实体中，像种族、部落以及封闭性的庇护网络等传统力量占据着支配地位。虽然阶级开始出现，但其力量相当弱小，因而并不存在着西方在近代曾经存在过的那种阶级联盟。现在的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即使是在国家的力量很弱的社会中，国家的自主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对于这种自主性的解释，主要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自主性主要是来自于对各种强力的垄断和社会内部的分裂。另一个是国际环境，如与宗主国、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联系，都可以提高国家的自主性的程度。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能力是相对较低的，国家的科层官僚机器常常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规模过分庞大，专业知识不够，而且缺少财政资源。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的低水平和能力的缺乏，使国家很难指导经济增长。在那些自主性和能力非常之低的国家更加关心的是维持统治精英的权力。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会主动地去阻止某一经济部门的发展。

三是“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模式。这种社会的特点是，国家的强度很高，但社会群体的力量也很强。人们经常讲到的例子包括墨西哥、印度、埃及等。但我们认为，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可以大体列入这种类型。上面所说的墨西哥、印